

## 第九章

# 局內人與局外人問題：《與歷史對話》

第五章結尾，我談到過度強調文化對比帶來的一些問題。2001年夏，我在一次關於義和團的講座中再次提及這一問題。講座的題目有意出人意料，叫「把義和團當作人」，聽眾多為西方人，這個題目對他們來說有挑釁的意味。我當時的觀點是，文化不僅可以塑造共同體 (communities) 表達自我思想、行為的方式，而且還可能造成不同共同體之間的距離，因此極易導致刻板印象、矮化、神話化對方的現象。在20世紀的中國、西方，義和團均歷經了無比尋常的醜化，因此我在講座中特別側重歷史上面臨類似挑戰時義和團與其他文化中人們的共同點。我不是希望否認義和團的文化特性，更不想把他們美化成天使，而是想幫助把他們從剝離人性的例外主義中掙脫出來，因為幾乎從義和團歷史開端，他們就被誤解、歪曲。<sup>1</sup>

文化差異與局內人、局外人對立息息相關，也與這些視角的眾多表現形式有關。整個職業生涯我都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國發現歷史》紙質第二版前言中，我重新探

究了歷史書寫中「局外人視角」的問題，此書最後一章已然探討局外人問題，認為局外人一些表現形式問題重重，一些則並無大礙，但我總是稱之為「問題」，是歷史研究的負擔，而非財富」。<sup>2</sup>一些學者與此意見相左，提出一些情況下歷史學家局外人身份可能帶來優勢，我最終接受了這一觀點（見本書第六章結論一節）。

## 勾踐故事在中國的地位

本章講述《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這個中國故事可能是局內、局外人對立的終極範例。但我想先簡要談談此書的另一核心主題：故事與歷史之間的強大連結。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就其1953年的戲劇《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作如此觀察：「如果這部劇在某國突然大熱，我幾乎可以馬上猜到該國當時的政治局勢：要麼是警告人們暴政即將到來，要麼是提醒不要忘卻剛剛經歷的暴政。」<sup>3</sup>《薩勒姆的女巫》取材於17世紀末麻薩諸塞灣薩勒姆鎮的審巫迫害案，但也明顯映射了米勒對自己生活年代的審巫行動，即麥卡錫主義的憤怒。《薩勒姆的女巫》由此象徵各個地方、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與歷史對話》的主題即故事與時局之間的共鳴，即敘事與當時歷史條件下生活其中的人們為敘事賦予的特殊含義。

理論上此類敘事可古可今，可虛可實，可內生可進口，但力量最強大的往往是該文化歷史上的敘事。中國當然也非例外，從古至今中國人都熱愛披著歷史外衣的故

事。越王勾踐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有趣事例，跨越整個20世紀，在形形色色環境下，這個故事以強大的力量與中國人產生共鳴。我初遇這個故事是瀏覽20世紀上半葉國恥史料時，很快發現這個敘事也與人們憂心的許多其他事情有關。清末之前，歷史傳播的主要方式除古代文獻之外，還有戲曲、演義等其他口頭、書面文學創作形式。20世紀到來後，故事傳播途徑擴大，加入報刊雜誌、啟蒙課本、大眾教育材料、話劇，及後來出現的廣播、電影、電視。

從古代誕生到現代，越王勾踐故事的核心結構堅固不變，但與其他中國古代敘事一樣，這個故事歷經演變，一些元素經過修改、刪減，還有增添。<sup>4</sup>原故事沒有、但戲迷津津樂道的次要情節之一，是勾踐重臣范蠡與美女西施之間所謂的愛情故事。勾踐故事的文本，不像契訶夫戲劇、奧斯汀小說一般穩固不變，其實甚至說勾踐傳奇包含「文本」都可能有些誤導，這個故事一開始出現時口頭傳誦在中國依然普遍，後世發展軌跡與其他眾多歷史人物無異，如聖女貞德，信史記載少之又少，敘事應不同聽眾、不同歷史時刻需求以及作者喜好不斷循環利用。<sup>5</sup>過去一個多世紀對中國人來說，重述勾踐人生故事的意義明顯不在於其中包含的歷史真相，而在於這個故事的多重吸引力。下文會詳述此點。

從鴉片戰爭（1839–1842年）到1949年共產黨贏得內戰，這所謂百年國恥之間，三教九流的中國人，從林則徐、曾國藩等清朝高官，到20世紀重要政治領袖蔣介石，再到舊金山灣天使島（Angel Island）移民站拘禁的底層移

民，或是菲律賓艱難度日的下等移民，都感到勾踐故事有非比尋常的魔力，面對看似束手無策的個人或政治難題時，總以這個故事激勵自己。<sup>6</sup>甚至共產黨上台，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截然不同的形勢下這個故事依然廣泛傳播。比如，勾踐故事頻繁出現在共產黨創作的戲劇中，意在傳播各種政治訊息；1949年後的台灣，這個故事為國民黨最終反攻大陸的目標提供心理慰藉、政治支持。

最後一點可以說明，勾踐故事等敘事是中國人共有的文化資源，深刻超越了政治分歧。這點值得強調，且於我意義非凡。我曾翻閱國民黨政府制定、台灣出版的1974年版中小學語文課本，當時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國共意識形態衝突達到頂峰，兩本課本中都有〈愚公移山〉一文，這篇古代寓言說的是無論面前困難如何巨大，只要意志堅定，就一定能實現目標。小學啟蒙課本上另一課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講述建設台南曾文溪水庫時克服的工程挑戰。<sup>7</sup>直擊我心的是，文革中這則寓言因為毛澤東的宣傳名聲大噪，是要求所有人背誦的「老三篇」其中一篇，鼓勵中國人民大眾挖掉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兩座「大山」。<sup>8</sup>歷史語境不同，含義不同，但這個故事作為中國文化基石的組成部分未曾釐變。

勾踐的故事，中國小學生耳熟能詳，不亞於美國小朋友熟悉《聖經》裡的亞當和夏娃、大衛和歌利亞——這個故事「刻在我們骨子裡，」幾年前一位中國學者對我如此說道。雖然勾踐故事在中華文化圈影響深遠，<sup>9</sup>但《與歷史對話》出版前，即使中國近世史美國學者（除華裔外）都知者

寥寥。研究中國古代史、古代文學的美國學者，熟稔勾踐故事的一般不知道這個故事在20世紀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很明顯，越王勾踐故事是文化知識的人工遺產之一，每個社會都有，是生於斯、受教育於斯「局內人」獲取的知識，經過文化培養灌輸為他們的一部分，但通過書籍、成年後短居於斯了解文化的「局外人」幾乎不可能碰到這些故事，或者碰到也不會在意。如此奇妙的局勢，說明文化學習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結果是過去一百年間，勾踐故事在中國歷史的地位美國歷史研究幾乎無人關注，或至少人關注，就我所知，更廣闊的西方史家圈子也是如此。

玄而又玄的是，一定程度上中國史家似乎也對其避而不談。我這裡不繞彎子，不像美國史家，做20世紀研究的中國史家對勾踐故事瞭然於胸，勾踐故事敘述、參引的普遍程度，尤其在特定歷史節點，<sup>10</sup>他們非常了解。但我很少看到有人明言，說故事與時局關係可以作為嚴肅歷史研究合適的對象。可能是因為特定時期這種深究政治過於敏感（下節細講）。但追根溯源，我懷疑大多數中國人對歷史一時局之間的關係只是簡單接受為既定事實。也就是說，他們自我意識中對此關注度不高。遙遠過去能以如此意義深重的方式與現在當時當地對話，這種概念早在牙牙學語時已深入他們骨子裡。他們關注這些故事可能包含的指導、勵志含義，但是不太可能向前一步審問故事一時局之間特殊關係的重要性，無論故事發生在中國，還是其他文化語境。

歷史學家沒有研究勾踐故事還有一層原因，這個故事雖然其他方面十分重要，但對20世紀中國歷史作用甚小。20世紀中國史被塑造為一連串事件的敘事，其中勾踐的故事幾乎可以完全刪掉（亦曾被刪掉），也不會對整體層面產生什麼重大影響。當然知識文化史許多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如果轉向勾踐故事對中國人自身經歷認知的影響，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寫道，我們「依賴現實的敘事模型，以此塑造每天的經歷。提到日常生活中認識的人，我們會說他是密考伯（Micawber）那樣的樂天派，或是托馬斯·伍爾夫（Thomas Wolfe）小說裡跳出來的悲觀者」，這些故事成為「經歷的模板」。他還說，這些模板令人驚訝的點在於，「它們如此特殊、本土、獨一無二——卻有如此大的影響。它們是大寫的隱喻，」他在另一處還說道，「是人類境況的根基隱喻（root metaphors）。」<sup>41</sup>

若將勾踐故事理解為布魯納所說的根基或類似隱喻，其歷史地位及對20世紀中國的影響就遠大於20世紀中國史的一般敘述。我在《與歷史對話》中希望闡明的正是勾踐故事的地位。在《與歷史對話》中我強調，自己主要關注的並非勾踐故事演化的進程，這部分最適宜由中國文學學者研究，而我關心的是中國人有時有意、有時無意間，以多重方式修改故事內容，以適應不同歷史時局的要求，以及故事和歷史的融合為何如此關鍵。

## 古時的勾踐

分析20世紀中國人心目中勾踐形象的意義之前，我先大概講講這個故事本身。<sup>12</sup> 還原勾踐故事時，我沒有過度糾纏一些事件、細節本身的歷史價值。20世紀這個故事的影響不在於史實準確程度，而在於敘事的力量。我在書中首先建立了所知的勾踐敘事在公元1世紀的基本面貌，當時我們知曉的完整版本首次出現。為此我追溯了早期文獻如《左傳》、《國語》、司馬遷的《史記》，和《呂氏春秋》。<sup>13</sup> 我主要參考時間相對靠後的《吳越春秋》後四卷，原為東漢趙曄公元58-75年撰。<sup>14</sup> 選擇《吳越春秋》原因有二。一是與其他早期文獻相比，這本書如姜士彬(David Johnson)所言，「更為詳實連貫」，而且「主題要素多有創新」。<sup>15</sup> 二是這本書深刻影響了帝制時代後續的勾踐故事敘事，也直接或間接成為20世紀許多流傳版本敘事的主要來源。<sup>16</sup>

勾踐故事的背景是春秋(公元前722-前479年)末年，吳(今江蘇省)越(今浙江省)兩鄰國爭霸，發生在當代中國版圖的東南沿海地區。公元前494年，越國國王勾踐繼位不久，正是二十多歲血氣方剛，不聽大夫范蠡諫言，發兵攻打吳國。越國兵馬很快被吳王夫差率軍圍困，越國必敗，大夫們因此力勸勾踐盡其所能求和，卑詞懇求並重金收買，希望夫差平息怒氣，甚至讓勾踐力保願與妻子作夫差階下囚，前往吳國。勾踐吞下自尊，默許求和策略。吳國太宰伯嚭為人貪財好色，大夫和勾踐商定私下以美女、珍寶賄賂伯嚭，爭取吳國朝廷內部支持越國。